

社 会 与 历 史 译 丛

共有的习惯



Customs in Common

[英]爱德华·汤普森 著
沈 汉 王加丰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社 会 与 历 史 译 丛

共有的习惯

Customs in Common

〔英〕爱德华·汤普森 著
沈 汉 王加丰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共有的习惯/(英)汤普森(Thompson, E. P.)著;沈汉,王加丰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社会与历史译丛)
ISBN 7-208-04236-5

I. 共... II. ①汤...②沈...③王... III. 风俗习惯史—研究—
英国—近代—文集 IV. K895.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48137号

Customs in Common

by E. P. Thompson

Copyright © E. P. Thompson 1991

本书由 Merlin Press Ltd. 授权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未经
同意,不得翻印、转载。

本书据 Merlin Press Ltd. 1991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吴书勇
封面装帧 甘晓培
编辑、出版总策划 朱金元

·社会与历史译丛·

共有的习惯

[英]爱德华·汤普森 著

沈汉 王加丰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0.25 插页 20 字数 499,000

2002年9月第1版 200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100

ISBN 7-208-04236-5/K·968

定价 45.00 元

社会与历史译丛编委会

刘北成

刘新成

杨 豫

侯建新

渠敬东

李 猛

郭 方

朱孝远

沈 汉

陈 勇

李 康

王明毅

献给马丁·伊夫
非凡的民俗学家

E·P·汤普森(代序)*

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 1924—1993)是他那一代人中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在发表多部重要的社会史著作的同时,就当代政治、讲演、讨论和论战等一系列广泛的学术和非学术主题发表了作品。这一卷收集的主要是限于他作为一个研究 18 和 19 世纪英国的历史学家的作品。尽管最后摘引的资料既有在他的书斋中收藏的家族文件,也有在英帝国广阔的地域内的资料,而它所论及的时期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在收入本书最后的几乎一个世代以前所写的两篇短论中,他提出了对于他正在论及的传统和他有同感的其他著作的看法。

起初,爱德华并不把自己看作一个有学者派头或学院派的学者,只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历史学家。除了历史著作以外,他还发表了一部小说和一系列的诗歌,它们中绝大部分已被收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一卷文集中。他还写了大量关于早期浪漫主义时期作家的文章,他最后完成的是对威廉·布莱克的研究著作。

1924 年爱德华出生时,他的家庭主要是在英国以外的地方生活和工作。他的父亲爱德华·约翰·汤普森(Edward John Thompson)当时作为卫理公会传教士在印度的事业已接近尾声。他是一个诗人兼学者,战时曾作为随军教士一直在美索不达米亚服务,并因在 frontline 英勇表现被授予军人十字勋章。战争期间当他

* 这是汤普森夫人应邀在 2000 年 8 月特地为本书中译本写的序言。

在巴勒斯坦休假时，遇到了出生于美国传教士家庭在贝鲁特长大的女子西奥多西亚·杰索普，并和她结婚。杰索普后来回到美国去做研究工作并短期在瓦萨学院任教。当他俩回到印度后，E·J·汤普森重新开始了对孟加拉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并同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建立了联系。到小爱德华（即 E·P·汤普森）出生时，他们回到英格兰，此时他们的长子威廉·弗兰克已经 4 岁了，而老爱德华当时受聘于牛津大学教孟加拉语。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间，他保持并发展了自己与印度文化和政治的联系，并成为英国印度独立运动支持者的主要代言人之一。

因此，E·P·汤普森成长在一种国际主义的氛围之中。孩提时代，他在黎巴嫩和美国生活过，同时在欧洲度过通常的家庭节庆日。17 岁时，他应征入伍，并在 1942 年被派到非洲，并从那里去了意大利。在意大利他参加了卡西诺战役。他的 21 岁生日是在意大利山腰的值勤中度过的。1945 年他回到英国，并在那年的秋季入读剑桥大学圣体学院。

他所受的教育、他战时的经历，或许还有他的气质，使他从心底批判社会现存权力结构及其制度。当时，只需要两年的学术研究就可以获得一个战时学位，于是他选择了攻读战时学士学位，并且凭他一流的成绩取得的奖学金进行了第三年课程的单独研究。他把这一年时间用于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文学和历史的研究，并且对许多历史哲学家进行了探索（包括维科和马克思）。尽管获得的是历史学学位，他首要的爱好恐怕还是文学，特别是诗歌和戏剧。他在 1946 到 1947 年间开始为成人教育班讲授历史课程时，经常谈及文学。他从未把历史看作是文学研究的“背景”，或者简单地把文学看作历史资料的来源。不管怎样，正如研究过去社会的任何其他方面那样，他确实把内容看作理解艺术作品最根本的东西。

他的第一部大部头的著作是 1953 年出版的《威廉·莫里

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它是第一部并且至今仍然是最彻底的一部考察莫里斯的政治学的研究作品。汤普森认为莫里斯的诗歌和设计是和他的政治和哲学观念分不开的。这也开始了他终生的工作，即对英国艺术和政治中的浪漫主义的探究。关于对莫里斯考察的著作，是他第一次转向涉及以某种机械的和目的论的形式来确定历史表象的作品。他发现它们不仅存在于政治和经济史的主流中，而且也存在他正在写作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方方面面中。多年以后，他在发表在《激进历史评论》上的采访记中，在回答“为什么一个威廉·莫里斯的传记作者转而在《辉格党和狩猎者》中去写温莎森林的生态学”这个问题时，他说：

这产生于贯穿我所有著作的一种成见，甚至在我看出它的……意义之前，根据这种成见，我注意到马克思有一种真正的沉默寡言，它存在于人类学家愿意称之为价值体系的领域中。

如他所认为的那样，问题存在于：

主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词汇的退化——它的敏感性的枯竭……(如果你喜欢的话)富于想象力和热情的整个领域的挤压，充满在威廉·莫里斯的晚期著作中……发达工业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造成的伤害，将限制作为初民经济学的人际关系。马克思……设想了革命的经济人。但是，特别在早期马克思那里，它也是含蓄的，而这种伤害从根本上限制了作为“经济的”人。^[1]

《威廉·莫里斯》的写作，正值爱德华取得他的第一个教职，他担任了利兹大学院外系导师组织者，为期5年。起初，他把这看作是一个短期的工作——他一开始便决定只干5年——以取得一份收入，这时他取得了作为一个自由作家的经验和联系。事实上，他在那里呆了17年，在这个时期，汤普森的3个子女都

出生了。

在约克郡西雷丁区的成年人教育工作、左翼政治、战时军队中的经历,以及他对于口传和记载下的文化深深的兴趣和关注,在不同层次上在他的第二部著作,即 1963 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得到表现。这仍然是他的一部名著,自出版以来始终没有停止发行。

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后,他在新建的沃里克大学取得了一个大学校内职务。他在那里担任了社会史研究中心的第一任主任。他在沃里克全心投入对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育工作。七年之后,他终于能够重新做一个自由作家。这时他的子女已经长大,而他的妻子可以去做全职工作。总之,因为不再要求他从事教师工作,他卷入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形成的欧洲和平运动。随后,他能够从这个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是因为他的健康开始衰退。在最后的 5 年他进行了一场抢时间的战斗,当时他得出版自认为还没有完成的著作,并且要重新发表那些他希望扩展成为第一流研究著作的文章。

他对于历史编纂学或史学理论写得不多,他宁可让理论从历史和文学著作本身脱颖而出。唯一例外的是,他的长篇论著《理论的贫困》采用了一种特别的系列论题的式样。他感到,这严重地抑制了对于主题创造性的探索。他时常表示,他和他从事的历史学总的说来受惠于马克思,但是,对于把自己称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越来越踌躇。他喜欢说,他按照马克思主义传统写作。他总是坚持:对于考察社会结构,阶级是一个有巨大价值的概念和工具。但是,他怀疑把它用于许多封闭的和自我确证的理论体系。有一次他说:“如果经过了数个世纪,我们还一直在谈论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恐怕是令人奇怪的,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无论如何,如同他的著作表明的,他确实发现了马克思关于阶级冲突的定义在分析历史的许多方面的价值。尽

管他习惯于用法西斯主义的例子说明还存在其他的東西,但是他感到那并没有解释的力量。

目前有好几本讨论爱德华·汤普森著作的书籍正在印行,而他的绝大多数重要著作仍然在重印。

多萝西·汤普森

注 释

- [1] Mahro, *Visions of History*, New York, Pantheon, 1984. pp. 20, 21—22.

前言和致谢

ix

本书的研究旨在提出一个密切相关的论点。这个论点在导论中已反复陈述。可是,我花费了比我曾设想过的要长得多的时间才完成了它。它开始于20多年前我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后不久写成的关于“时间”和“道德经济学”的著作。之后,它被关于18世纪刑法的著作(它们是《辉格党和狩猎者》以及和沃里克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同仁合写的《阿尔比恩的致命之树》)耽搁下来。然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因为“第二次冷战”的发生以及和平运动的强烈需要,我再一次转变了方向。我对此并不后悔;我确信,和平运动对于驱散像降临到政治和精神生活每个领域的乌云一般的冷战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些困难(同时我健康状况不佳)严重地拖延了《共有的习惯》的写作。

现在我该解释一下,我对连贯地阐述这个论点做了些什么。有两章是早期发表的重印未加修改的论文。这便是最初发表在1967年12月《过去和现在》第38期上的《时间、劳动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和发表在1971年《过去和现在》第50期上的《18世纪英国群众的道德经济学》(以下简称《道德经济学》)。就第一篇论文而言,因为当有趣的关于时间问题的新著完成时,看起来并不要求对我的文章作任何重大的修正。由于别的原因,我把《道德经济学》保留下来。这篇论文一直被广泛地讨论、批评并得到发展,一些论点被以后的研究超越。最初,我努力地去修改它,使它跟上最新的研究成果。但是,这证明是没有希望的苦差使。它是对于最初目标的一种怀旧活动。我发现,我正在修改一个其他学者已对

x

它作出许多评论的文本。因此,我重新发表最初的论文,并写了一篇全新的、篇幅更长的论文《道德经济学的再考察》,在该文中,我回答了某些批评,并考虑到其他人提出的问题。

书中其他的专题论文,既有经过大量修改的旧作,也有在这里初次面世的新作。《导论》与《贵族和平民》收入了最初在《社会史杂志》1974年夏季第7卷第4期发表的《贵族社会,平民文化》和1978年5月在《社会史》第3卷第2期发表的《18世纪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一些段落。短文《大声喧哗》,最初以《“大声喧哗”:英国的不协调的音乐*》为题发表在1972年3至4月第27年第2期《经济、社会、文化年鉴》上。我感谢编者和杂志允许我利用这些资料。

我还要感谢那些研究所和同事,他们接待我并向我提供教学以及在如此长时间里与历史学职业保持联系的机会。这包括若干所美国大学(匹兹堡、拉特格斯、布朗大学和达特莫斯学院),同时还有一系列印度大学以及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道格拉斯·罗布爵士讲座。我特别感谢三所大学冒着风险邀请我去访问——当时我已经荒疏了——使得我能够在长期转而投身和平运动之后,恢复我学者的声誉。这些大学中,首先是安大略省金斯顿的女王学院(在1988年)邀请了我;曼彻斯特大学在1988至1989年授予我西蒙高级研究员的身份,而拉特格斯大学在1989至1990年任命我为拉乌尔·瓦伦伯格杰出访问教授,在历史分析中心工作。没有这种慷慨的帮助和有共同思想感情的同事的促进,我恐怕已失去与自己职业的联系。最后,我热忱地向伯明翰大学表示感谢,它授予我人文高级研究学院院士的身份,向我提供图书馆和研究的便利条件。

* 原文为法文。——译者注

如果我打算向每一个向我提供咨询的人(例如关于“大声喧哗”和“卖妻”)表示感谢,那么这个前言将会长达几页。在某些情况下,我已在我的注释中向提供者致谢。我必须因忽略了其他人而请求原谅。在那些曾提供信息或与我交换意见的人中,有:约翰·贝蒂、已故的凯瑟琳·巴姆斯特德、安德鲁·查尔斯沃思、罗宾·克利夫顿、佩内洛普·科菲尔德、安娜·达文、纳塔利·戴维斯、伊莎贝尔·埃米特、已故的 G·尤尔特·埃文斯、约翰·法因、约翰·弗莱彻、维克·甘蒙、约翰·杰利斯、英奇·古德温、杰克·古迪、已故的赫伯特·古特曼、米利安·哈伯、布赖恩·哈里森、J·F·C·哈里森、马丁·英格拉姆、琼·莱恩、路易斯·麦凯、已故的戴维·摩根、波利·摩里斯、布赖恩·帕尔默、阿尔弗雷德·皮科克、约奥沃斯·普罗瑟罗、阿诺德·拉顿伯里、鲁思·理查逊、约翰·鲁尔、拉菲尔·萨缪尔、彼得·西尔比、罗伯特·申顿、保罗·斯莱克、莱恩·史密斯、迈克尔·索南舍尔、琼·瑟尔斯克、基思·托马斯、德罗尔·瓦尔曼、约翰·沃尔什、E·R·亚拉姆、艾琳和斯蒂芬·约。还应当特别感谢已故的 E·E·多德,他在公共档案局为我承担了许多搜寻资料的工作。还要感谢马尔科姆·托马斯(现任尤斯顿路友好大厦图书馆馆员),他所给予的服务使我有幸得到了一个研究助手;感谢艾德里安·兰德尔、温迪·思韦茨和约翰·瓦尔特,因为他们敏锐地批评了我关于“道德经济学”的原文;要感谢先前合作编辑《阿尔比恩的致命之树》的道格拉斯·海和彼得·莱因博,因为他们提供了关于法律、刑法和许多其他问题的建议;感谢罗伯特·马尔科姆森和雷克斯·拉塞尔,因为他们慷慨大方地就卖妻和农业事务提供咨询;感谢罗伊·帕尔默,因为分享了他无穷尽的关于民谣和诽谤文献的专门知识;感谢尼古拉斯·罗杰斯,因为他使我接触到他关于伦敦和地方民众的进行中还未完成的著作;并且感谢珍妮特·尼森,她很快就要发表的关于 18 世纪平民的著作将改变对那个世纪农业和社会史的理解,

并且感谢深深地受惠过的那些具洞察力的人。还要特别感谢伊夫琳·金,她熟练地辨认我多次修改过的手稿并为我打字;感谢两位多年的朋友,他们是我在美国的出版商、最近直接创意《众神丛书》的安德烈·希夫林,此先在兰多姆家族的实利主义政策之下是完全不可能的;以及英国默林出版社的马丁·伊夫,他在我每次遇到困难时帮助了我。他们两位对我长期的拖延,始终表现出特别的耐心并给予鼓励。最后,多萝西·汤普森一直是我工作的帮手,她在超过 40 年的时间里分享我的兴趣,并在每一章打印出来后加以评论。若没有她的各种帮助,这部书恐怕无法完成。

我还要向在我的注释中提到的图书馆和郡档案馆致谢。这些当然包括大英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出版物部和公共档案局。由于得到了英国文书局主管官的同意,阅读了公共档案局中王室拥有版权的正式文本案卷,并感谢被允许复制插图 V 和插图 VII。我还要向塞西尔·夏普府邸的图书管理员致谢;向乔蒙德利侯爵致谢(他允许我利用乔蒙德利“霍顿”文件,现在收藏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向密执安州安阿博的威廉·L·克莱门特图书馆的管理员致谢,因为允许我查阅谢尔本文件;向尊敬的圣奥尔德温伯爵致谢(因为允许我使用查尔斯·威瑟斯文件);向马尔巴勒公爵阁下致谢(因为允许我使用收藏在布伦海姆宫的森德兰伯爵的文件);向克劳福德勋爵致谢,因为他允许复制插图第 XXIX 和插图第 XXX,并且向在注释中和正文中所有提供其他资料的人表示感谢。第 127 页(英文版)引自 A·W·B·辛普森的《土地法史》(牛津 1986 年第二版)的段落得到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许可。我还要向大英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出版物部致谢,因为他们允许我复制他们藏品中的资料作为插图。

1990 年 12 月于伍斯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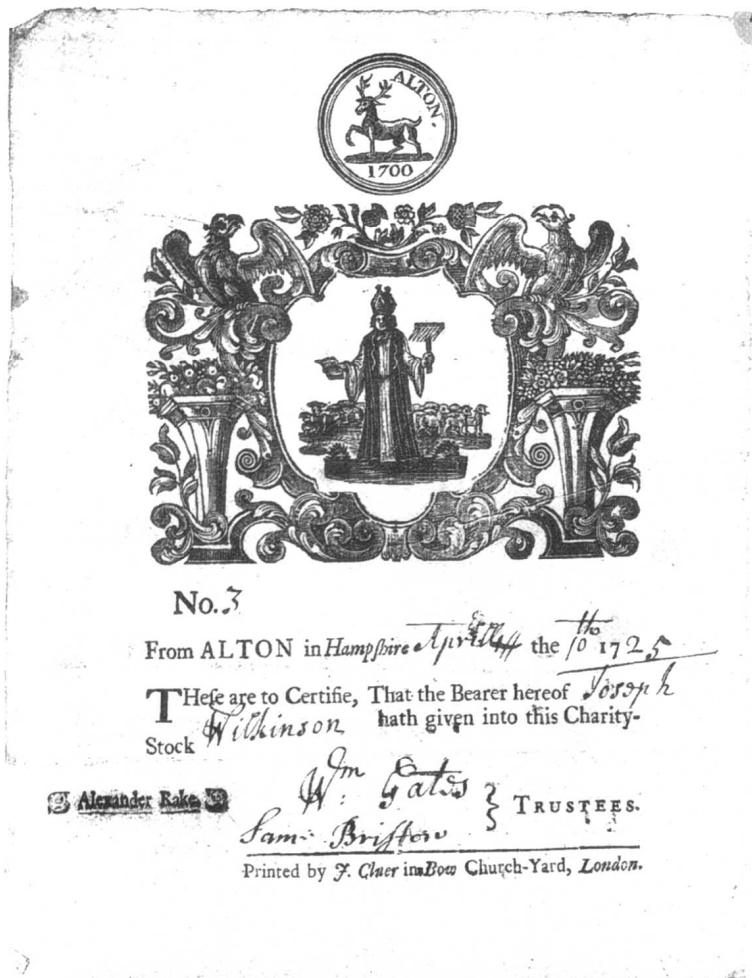


图1. 现存最早的工会会员卡之一, 归档在国王的宣誓书中, 时值1725年汉普郡奥尔顿的梳毛工被起诉(见英文版第59页)。注意, 该工会(或“慈善团体”)有一个伦敦的印刷工, 他声称工会是1700年建立的。布莱策主教是梳毛工的庇护人, 位于图的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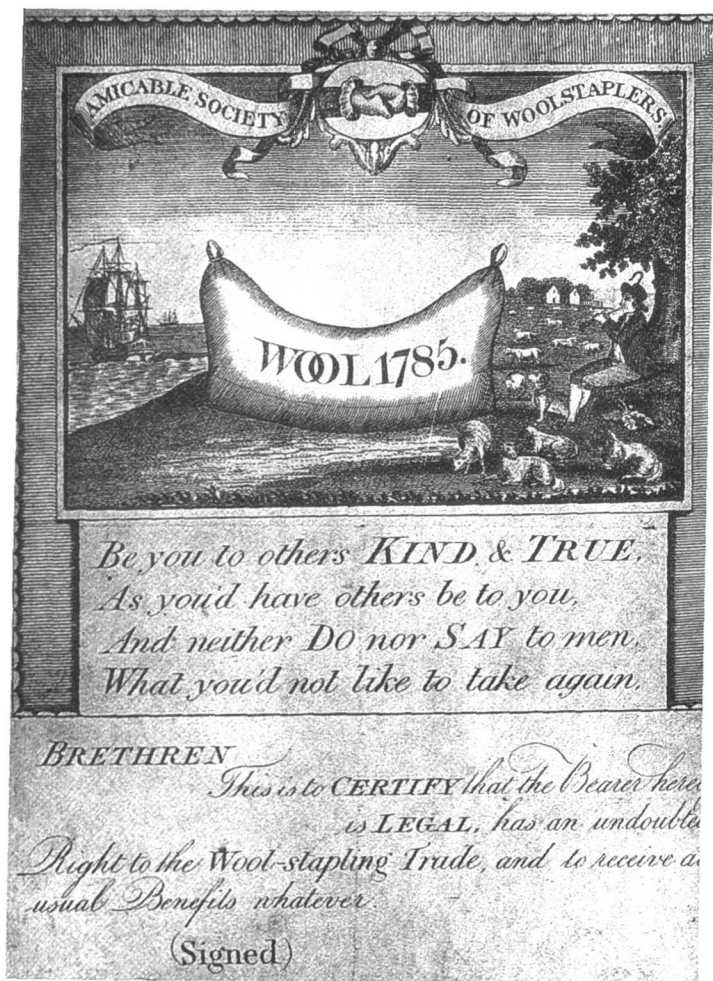


图 II. 1785 年分理羊毛工友好协会的资格证书，上面的文字
 恳求同行业的联合，与田园生活而不是与工业结合。



图Ⅲ. 这张 1838 年梳毛工人工会会员卡，仍有布莱策主教的像置于卡上部中央。